



唐  
诗  
名  
篇



品  
鉴

梁 扬  
马 丕 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TANGSHI MINGPIAN PINJIAN



唐诗名篇

品鉴

梁扬  
马丕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TANGSHI MINGPIAN PINJI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名篇品鉴 / 梁扬, 马丕环 著. -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63-5809-6

I. 唐… II. ①梁…②马 III. 唐诗 - 鉴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504 号

# 唐诗名篇品鉴

梁扬 马丕环 著

### 出版发行

发行电话

E-mail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印制

印 刷

规 格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号:530028)

(0771)5523216 5523226 传 真:(0771)5523246

CR@gxmzbook.cn

尹福建

马 铭

马 铭

蓝剑风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889mm×1190mm 1/32

16.75

460千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版印刷

ISBN 978-7-5363-5809-6/H·27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523216



## 自序

诗唐——这是闻一多先生的提法。他在《唐诗杂论》中说：“一般人爱讲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我国素称诗的国度。从先秦的原始歌谣、诗经、楚辞，中经汉魏六朝的乐府、古诗，再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诗词散曲，四千年奇光异采闪烁不息，汇聚成一条光辉灿烂的银河，亘贯于中国文学的广袤星空。这条银河中最耀眼的星群，毫无疑问就是“诗唐”最具标志性的极品——唐诗。

唐诗的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仅据清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二千八百七十三位，诗作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共九百卷，其中有别集者六百九十一家。另有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续收唐五代逸诗六千三百余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校》新辑唐人逸诗近千首。这些存世之作虽然只占唐代近三百年间大量诗作的极少的一部分，却已超出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余年存诗总数的二至三倍；知名诗人多达两千余人，风格独特的诗人也有五六十人，远超自战国至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不但涌现了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元稹、李绅、张籍、王建、韩愈、孟郊、李贺、贾岛、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

优秀的诗人，而且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性的大诗人。唐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之高和题材、形式与流派之丰富多样，更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代胡应麟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缙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概括地说明了唐诗全面发展的情况及其普及的程度。

唐诗的传播方式与范围之多之广也是空前的。既有宴会高朋即兴赋咏的热闹一时，也有乐坊名妓谱曲传唱的闻名遐迩；既有缀为“行卷”奔走于名流府第的拱手呈送，又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的标价而沽；既有挥洒于亭观寺驿之壁以抒怀抱的豪放之举，也有题之红叶御沟传情终结良缘的浪漫行为；既有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的普及底层，又有“胡儿能唱琵琶篇”的远播境外……

唐诗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奉为典范。后人的搜集整理、编选笺注和品评研究从未间断过。唐诗总集除了《全唐诗》九百卷以外，还有更早的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选集方面，有唐代《唐人选唐诗》十种，宋代李昉等《文苑英华》一千卷、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明代张之象等《唐诗类苑》，清代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等，都是规模较大的选本。而最为人所熟悉的选本则是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历代研究唐诗的著作也极为丰富。唐孟荣《本事诗》、张为《诗人主客图》，宋洪迈《容斋随笔》、计有功《唐诗纪事》、敖陶孙《臞翁诗评》、严羽《沧浪诗话》，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高棅《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癸签》、王世贞《全唐诗说》、胡应麟《诗薮》，清钱良择《唐音审体》、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刘熙载《艺概》等，都是有名的专著。今人的唐诗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而以闻一多《唐诗杂论》、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任中敏《唐声诗》、傅璇琮《唐代诗人丛

考》、陈伯海《唐诗汇评》等最具权威性。

有学者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历代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研究论文等数万个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以寻找历代读者所认定的经典名篇，得出了唐诗一百首名篇的排行榜。其中，崔颢《黄鹤楼》位居唐诗“十大金曲”之首。宋曾慥《类说》记载，李白曾登上长江边的黄鹤楼，被眼前美景所吸引，正想题诗留念时，抬头忽见墙上崔颢这首诗，自认为难以企及和超越，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仙李白都为之心折而搁笔。看来，该诗位居第一当之无愧。名列第二的是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杜甫《登高》和王之涣《登鹤雀楼》并列第三。第五至第九名依次是：张继《枫桥夜泊》、李白《蜀道难》、杜甫《登岳阳楼》、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白居易《琵琶行》、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王湾《次北固山下》则并列第十名。根据创作名篇的多少，该文又列出了唐代十大诗人的排名：杜甫第一，李白第二，王维第三；接下来依次是李商隐、杜牧、王昌龄、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和岑参。这十位诗人，可称唐代诗坛的“十大天王”。在唐诗一百首经典名篇中，杜甫独占十六首，李白占十三首。由此可见，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二人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地位。（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该“排行榜”公布后，立即引起网上热评，有网友斥之为“恶搞”、“炒作”。其实，作者只是借用现代娱乐圈中的流行提法，以增添论文的趣味性、可读性，其文献资料之丰富翔实，研究论证之细密严谨，实在无可厚非。当然，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自古皆然，尤以唐诗为甚。要想对唐代诗歌发展流变脉络和诗人流派风格个性作一梳理品评，趋时取巧既不易讨好，则以下仍用平实理路试加论述。

唐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社会背景的变迁和艺术追求的不同，形成若干个自然段落。明初高棅说：“有唐三百年诗，众

体备矣，……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唐诗品汇·总叙》）从此四唐就成为唐诗的分期。这也是整个唐代文学的分期。

初唐时期，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618-712），约一百年。“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唐诗品汇·总叙》）唐开国之初，太宗李世民及周围文人的创作受齐梁宫体积习的影响，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当时宫廷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应制颂圣、润色鸿业，大多琢磨技巧，雕饰辞藻，而“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诗风代表。但同时也有以隋为鉴、谏议讽喻等内容，诗风开始由六朝绮靡浮艳向典雅中和转变，例如太宗《帝京篇》藻赡精华，魏徵《述怀》气韵高古，虞世南边塞之作精警苍劲，皆称力作。此外，上官仪提出“六对”（正名、同类、连珠、双声、叠韵、双拟对）、“八对”（的名、异类、双声、叠韵、连绵、双拟、回文、隔句对）之说，对诗歌的“当对律”作了初步总结，对律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初唐的前五十年基本上是宫廷诗的时代，也有在野诗人王绩“以真率浅疏之格”（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特立于初唐诗坛，其《野望》等自具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境界，惠及初唐四杰，并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

初唐的后五十年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起唐诗风范。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在审美追求上从宫廷诗人应制咏物以颂美为主的写诗倾向，完全转向了激扬文字、不平则鸣的独抒怀抱。其作品有一种刚健骨气、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卢照邻《行路难》、骆宾王《帝京篇》等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



蜀川》、楊炯《從軍行》等五律名篇，在促成五言律的定型化方面作出了貢獻。

繼之有沈佺期、宋之問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蘇味道、杜審言），他們的作品多是奉和應制、點綴升平，而在其他題材中卻不乏佳作，如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宋之問《渡漢江》、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等。但沈、宋的主要貢獻在於不僅將永明體的四聲律簡化為唐詩的平仄律、將消極的回避聲病簡化為積極的調聲，使得詩歌格律化的追求變得簡單易行；而且將五言律的粘對法則應用於七言體詩歌，完成了七言律詩體式的定型。嚴羽《滄浪詩話》說：“風雅頌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兩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律詩體制的最終形成，在我國詩歌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與沈、宋同時的張若虛和劉希夷，長於對人生的思索與內省。張詩僅存兩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將畫意、詩情與對宇宙奧秘和人生哲理的體察融為一體，創造出情景交融、玲瓏透徹的詩境。王闓運評之為“孤篇橫絕，竟為大家”。（《論唐詩諸家源流》）

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轉變唐代詩風做出重大貢獻的，是陳子昂。其代表作有《感遇》三十八首和《登幽州台歌》。後者短短四句，卻在悠遠蒼茫的時空背景中抒發了得風氣之先的伟大孤獨感，透露出英雄無用武之地、撫劍四顧慷慨悲歌的豪俠氣概。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批評齊梁間詩“彩麗竟繁而興寄都絕”，主張復歸《風》《雅》的美刺比興傳統，追蹤多悲涼慷慨之氣的建安風骨，寄托濟世的功業理想和人生志氣。他還提出了“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的詩美理想，要求將豪情與俠氣同聲律和詞采之美結合起來，創造剛健而瑰麗的文學。這些主張後來得到李、杜、白、韓等唐代大詩人一致推許，不愧為一代文宗。

盛唐時期，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永泰二年（713-766），約五十年。“自後曲江繼起，浸浸稱盛。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百年之大成。……其輔二家而起者，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劉昫虛、裴迪、儲光羲、常建、崔顥諸



人。而元结又有《篋中集》一选，集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徵明、元融七人之作，都为一卷，其诗直接汉人。故论诗者至开宝之世，莫不推为千载之盛也。”（鲁九皋《诗学源流考》）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其诗往往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充满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美称的盛唐之音。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和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分别用或豪迈奔放、或宁静优美的音符，弹奏出盛唐之音的不同音部；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则无疑是演唱出盛唐最强音的时代歌手。

边塞诗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有关战争的全景式的现实，且大都具有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境界高远的特点，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但各家所写亦有所侧重。高适“以诗人而为戎帅”（《旧唐书》本传），善用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防问题，抒发安边定远的理想，赞颂将士的忠勇和牺牲，反映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谴责不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代表作有《燕歌行》、《别董大》等。岑参凭好奇的个性、审美的态度和昂扬进取精神，为大西北的奇异风光传神写照。其《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描绘火山沙漠、冰川雪海的奇趣与兴味，烽火杀伐、边地生活的刺激和悲欢，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七绝圣手”王昌龄《出塞二首》、《从军行七首》诸作，在抒发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爱国情怀的同时，还流露出渴望和平、反对扩张战争的思想倾向，并对人民和战士的痛苦（包括征夫思妇的幽怨）寄予极大的同情。这一派名家中还有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祖咏、陶翰、刘湾、张谓、薛据、崔曙等。

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和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到盛唐合流并得到空前的繁荣，形成山水田园诗派。此派诗作描写山水田园风光以及隐士的高雅行径和闲逸情趣，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喜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王维精通音乐，擅长绘画，又潜心佛法，故其山

水田园诗同时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禅味，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境界，兴象玲珑而又冲淡空灵。代表作为《终南山》、《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山居秋暝》、《鸟鸣涧》等。另有《渭城曲》、《伊州歌》、《相思》等，当时即被谱成歌曲广泛传播。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取材于日常所见所感，往往即兴而发、随意点染，便成自然平淡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过故人庄》、《与诸子登岘山》、《春晓》、《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后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写洞庭湖的壮丽景色，“冲淡中有壮逸之气”（胡震亨《唐音癸签》），呈现出非同凡响的盛唐气象。储光羲《杂咏五首》、《江南曲四首》等表达隐逸情趣的作品，“格高调逸，趣远情深”（殷璠《河岳英灵集》），风格极似孟诗。这一派名家中还有张子容、崔国辅、常建、裴迪、刘昫、丘为、綦毋潜等。

李白诗歌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他那率直的性格，坦荡的胸怀，奔放的热情，浪漫的理想，豪侠式的行为，无一不是盛唐式的。他有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但在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政治趋向黑暗的现实无法施展，因而写出许多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猛烈抨击黑暗政治、冲击封建礼教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对光明的热烈追求和强烈的叛逆精神。如《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他写山水、友谊、爱情、妇女等题材的篇章，如《蜀道难》、《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玉阶怨》、《越女词》等，也都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伟景观，亦不乏标举风神情韵、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以及清新纯朴的民间气息和活泼生动的民歌情调。这种豪壮奔放与清新明秀之美，构成他所特有的飘逸豪放的艺术风格。李白的诗歌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盛唐时期的时代心理和社会生活，诗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气势、大胆的夸张、惊人的想象、强烈的个性，以及不可复制的天才的魅力，征服了当时以及后代的无数读者，使他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杜甫的诗则是唐帝国由盛转衰动乱时代的“诗史”。他经历过

歌舞升平的开、天盛世，也经历过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以盛唐人的胸襟和目光关切着时代动荡的脉搏，养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底层百姓的命运，对王朝中兴充满渴望而又缺乏信心；饱经沧桑，屡遭不幸，时生迟暮之感，但政治热情从未衰减过。因而创作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北征》、《兵车行》、《岁晏行》等一大批纪实性作品，以及《登高》、《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描写苦难现实和咏叹身世相结合的篇章。其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警句，所概括的贫富悬殊对立的典型形象，正是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表现。而那些热爱和平生活抒写闲适情趣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等，则写得十分从容与优雅，令人心向往之。杜甫处境与情感本身的复杂，及其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使他以理智节制澎湃的激情，并选择严格精细的诗律和技巧、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情，使其诗呈现出以沉郁顿挫的风格为主，同时又“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秦观《论韩愈》）的多种风貌。杜甫主张“转益多师”，对从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各家推崇备至，其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这使他成为集大成者。在由自然清新、兴象玲珑的盛唐诗到注重思致与锤炼的中唐诗的演变过程中，杜甫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新变的开启者。在整个唐代诗歌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也使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

中唐时期，自代宗大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766-835），约七十年。“盖一代之诗，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极而衰即伏其中。于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变之上者则中兴，变之下者则愈降。古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也。……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格渐损。故昌黎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李以博丽胜，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此期时局相对

稳定，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使国步维艰，危机加剧。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实和社会，进行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多方尝试变革与创新，于是名家辈出，流派众多，风格纷呈，出现了“中唐之再盛”（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的繁荣局面。

此期又可分为大历、元和两段，大历乃一过渡时期。以钱起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湓、夏侯审），钟情于寻常林潭泉石，具有冷漠寂寥的情思和清空幽隽的诗风。虽有意追慕、模仿盛唐，但境界浅狭，气骨衰弱。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之作，颇有思想深度，是杜诗的余绪。刘长卿诗多咏山水隐逸，清新含蓄，字句研炼，极富韵味，权德舆推为“五言长城”。李益的七言绝句边塞诗，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从慷慨壮烈中透出悲凉伤感，胡应麟誉称“开元之下七言绝第一”。韦应物的诗则突出表现闲适生活的宁静野逸之趣，如《滁州西涧》、《寄全椒山中道士》诸篇，“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自成一家之体。张继、戴叔伦、郎士元、戎昱等诸名家诗，也各有特色。

元和时期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自觉承传李白豪放和杜甫沉雄的传统，强调“不平则鸣”和“笔补造化”，作诗好为奇崛，追求险怪生僻之风。韩愈才富学博，善于捕捉前所未见的险怪意象，喜欢创大篇、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追求不美之美，甚至以丑为美，并首开以文为诗先河，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如《山石》、《陆浑山火》、《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孟郊作诗，“刳目铍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以苦吟著称。其诗抒写穷愁寒苦的生活，造语炼字力避浅率平庸，多有超常奇特的构思和幽冷苦涩的意象，风格生新瘦硬，以《秋怀十五首》为代表。也有《游子吟》这样平易古拙的小诗。李贺是个早熟、奇特而短命的诗歌天才，一生呕心沥血，以诉说怀才不遇的悲

愤与苦闷为基本情调。其诗想象奇特，色彩斑斓，措语独到，多有感伤意绪和虚幻意象，形成了诡怪荒诞、奇崛冷艳的唯美风格，如《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梦天》等。卢仝、马异、刘叉、皇甫湜诸家，写诗亦以奇险怪异著称，各有佳作传世。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则重写实、尚通俗，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热潮，即新乐府运动。白居易论诗强调为政治服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其《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讽谕诗，深刻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尖锐揭露时政弊端和权贵的腐化丑恶。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写唐明皇、杨贵妃生死之恋，《琵琶行》为琵琶女感今伤昔而作，均将叙述、描写与抒情相结合，情感真挚而又流畅华美，风情摇曳而又生动传神，有声有色而又可歌可泣，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元稹的叙事长诗《连昌宫词》写玄宗荒淫腐化往事，借往鉴今以为讽谏，成就直追白氏《长恨歌》。其爱情诗与悼亡诗如《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缠绵哀感，委婉动人。小诗《行宫》也言浅意深，含蓄隽永。李绅、张籍、王建等人的新乐府，也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批判现实的精神。

刘禹锡和柳宗元同为“永贞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又都被长期流贬穷僻荒远之地。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如《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聚蚊谣》等，对政敌的迫害报以强烈的反抗和轻蔑，表现出开朗乐观、倔强不屈的精神。其咏史诗，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等，借古讽今，绵里藏针，既充满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又自有一股豪宕慷慨之气。而那些拟民歌如《竹枝词》等，则表现出清新爽朗的情调和浓郁的民歌色彩。柳宗元诗多以抒发离乡去国的情思和抑郁悲愤的意绪为基调，风格凄冷清峭。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不仅写尽离乡别友的悲情，还表现了对时事的忧伤和处境的险恶。《鼓乌词》、《笼鹰词》等寓言诗，托言禽鸟以讽刺现实，宣泄对政敌鬼域伎俩

的憎恶。《江雪》、《渔翁》等山水景物诗，在冷峻激切中流露志士骚人的傲骨哀怨，境界苍茫辽远而又韵味悠然。

晚唐时期，自文宗开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836-906），约七十年。“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其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落照，诗人们深感回天乏力，便只能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反复咏叹着时代的悲哀与绝望，故淡泊情怀与艳情绮思的主题十分流行。这一时期，盛中唐的各种流派、风格、创作手法都有所继承，但就主要倾向而言，除了一部分诗人继续承传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外，更多的作者颇有向齐梁回归的趋势，浮艳之风又再度充斥唐末诗坛。

杜牧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主张创作要重视思想内容，“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艺术上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献诗启》），反对晦涩、香艳、庸俗。他写诗常把忧国悯民的壮怀激情同伤春惜别的柔情绮思相交织，追求一种流丽中有劲骨，悱恻中含气势，韵致天然却俊爽峭健的艺术风格。《河湟》、《早雁》等感时伤世之作，对被异族侵掠流散边地的人民寄予忧念和同情。《山行》、《江南春》、《泊秦淮》等写景抒情绝句，画面鲜活，寄托远大，情思豪爽，在当时诗坛独树一帜。《过华清宫》、《乌江亭》等咏史诗，将写景、抒情同怀古咏史紧密结合，富有史识而又暗含政治讽谕意义，有一种深沉的对盛衰兴亡的历史感慨。与杜牧有交往并受其激赏的张祜、许浑和赵嘏，以及稍晚的刘沧，所写咏史诗吊古伤今，悲而不壮，凄凉萧瑟，是当时时代氛围的曲折反映。

李商隐不仅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而且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坛上都堪称独步。他的政治诗，涉及现实社会政治内容有相当广度，长诗《行次西郊一百韵》即具有诗史的规模。《南朝》、《隋宫》和《瑶池》、《贾生》等咏史诗，或从“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的

观念出发，对历代沉湎女色、穷奢极欲以致亡国灭身的君王进行揭批，或以天下治乱“在人不在天”（《行次西郊一百韵》）的真理对照，讥刺君王们求神仙的虚妄和他们好鬼神胜过爱人才爱百姓的愚行，借咏史以讽谕本朝皇帝。由于时代的动荡离乱和个人的坎坷失意，李诗往往流露出浓厚的感伤、迷惘和消极的情绪，并以缜密的构思、遥深的寄托、哀婉的情调、瑰丽的形象和严整的格律，来表现其独特、细腻而又敏感的体验，从而构成沉博瑰丽而又扑朔迷离的诗境和富有悲剧色彩的凄艳浑融的风格。这在他那些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常常交织着男女主人公的希望、失望以致绝望的种种心情，表现了士大夫爱情生活的特点和弱点。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二句，以生动优美的形象来表达执着不渝的爱情，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有的篇章由于使事用典过密和内涵的复杂多义，境界瑰丽而朦胧，题旨却深曲难解，如脍炙人口的《锦瑟》，但并不妨碍人们从多方面去欣赏它的美感。

温庭筠当时诗名与李商隐相伯仲，人称“温李”。但温庭筠是长期“狂游狭邪”（《新唐书》本传）的典型浪子，对异性缺乏李诗那种真情挚爱，喜欢堆砌绮艳词藻写灯红酒绿倚香偎玉的生活。故其爱情诗华美秾丽而又轻靡浮艳，既带有齐梁宫体的旧痕，又显出新兴词体的某些特征。这种阅历和风格体现在词的创作中，便构成其特有的“香而软”的词风，并使他成为晚唐五代“花间词派”的鼻祖。后来他离开冶游生涯，在羁旅行役中开阔了眼界，写出《商山早行》、《过陈琳墓》这样或清新秀美，或深沉感人的作品来。与温庭筠同时的韩偓著力于“皆裾裙脂粉之语”（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的“香奁诗”，吴融、唐彦谦也多写士人的闺阁情怀与爱情题材，但在诗味隽永方面皆远逊于温、李。

晚唐诗坛还有许多颇有才华、各具特色的诗人。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人，多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极少反映社会问题，写诗往往着意为之，推敲锤炼，以苦吟著名。诗风清新奇僻，境界却未免浅狭。以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等人为代表的隐逸诗人，因



世乱而退隐，但求平安不问世事，其诗多表现避世独善的闲情逸趣与淡漠情怀，带有清幽淡泊之风。以韦庄、聂夷中、于濬、曹邺、杜荀鹤、罗隐、郑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品多表现民生疾苦、离乱之感与现实讽喻，具有“新乐府”的精神，同时也难免带上浓重的凄凉黯淡的末世情调。

前人对晚唐诗歌的评价大抵偏低。清代“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叶燮《原诗》外编下）现代宗白华先生说：“历史说明自中唐以后，唐朝向衰亡的途上走去，藩镇跋扈，宦官窃柄，内乱外患，相逼而至，在这样国运危险万分之际，晚唐诗人应该怎样本着杜少陵的非战文学，积极的反对内战！应该怎样继着初唐、盛唐诗人的出塞从军的壮志，歌咏慷慨的民族诗歌！然而事实是使我们失望的！晚唐的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他们只知道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美学散步·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其实这些见解都未免偏颇，晚唐诗坛决非一派衰颓。叶燮就曾指出：“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原诗》外编下）李商隐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若以白日四段比之唐诗四期，则初唐如清晨金轮有喷薄之力，盛唐似正午骄阳具中天之炽，中唐像下午烈日呈普照之势，晚唐如傍晚余晖有灿烂之美：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诗空中最耀眼星群的完美之链，何可偏废？！

泱泱诗唐，煌煌唐诗。对于存诗近三千家五万余首的空前强盛的诗坛阵容而言，上述对四期诗歌发展流变脉络和诗人流派风格个性的简单述评，难免一叶障目、挂十漏万。况且多数诗人的一生，因生活阅历和艺术追求的变化，自身已有早、中、晚期的不同。而且愈是名家、大家，其题材、风格愈具有多样性，这也正是其诗艺臻于成熟的标志。例如，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王维，也写过《使至塞上》、《观猎》和《燕支行》、《老将行》这样壮伟昂扬的边塞诗与咏怀诗；杜甫青年时代过的是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贵公子生活，其《望岳》洋溢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主义豪

情和幻想，此后十年长安备尝辛酸，安史乱起历尽坎坷，这才写出大量现实主义的“诗史”之作；皮日休本来推崇儒学，有兼济天下之志，名篇《橡媪叹》极具美刺锋芒，但结识隐居的陆龟蒙后，即与之唱和转向江湖隐逸一派；等等。因此，从诗人及其题材、风格的归类来说，也只能就其主要特征进行大体的划分，未必尽当。

本书对一百二十六首唐诗名篇进行品鉴。品鉴中不作面面俱到的详尽疏解，仅就名篇的创作背景、作者心态、题材处理、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异之处，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美学鉴赏或结构分析，以帮助读者把握其特点、要点。不足、谬误之处，尚祈读者指正。明清以来许多画家对唐诗名篇多有配图，体现出他们对唐诗的欣赏与理解。我们从《唐诗画谱》、《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绘图唐诗三百首》、《绘图千家诗注释》、《吴友如画宝》及日本《唐诗选画本》等书中精选部分画作，希望能增添读者阅读的兴味，并有助于本书成为一窥唐诗风采奥妙的最佳入门。

梁 扬 马丕环

2009年8月